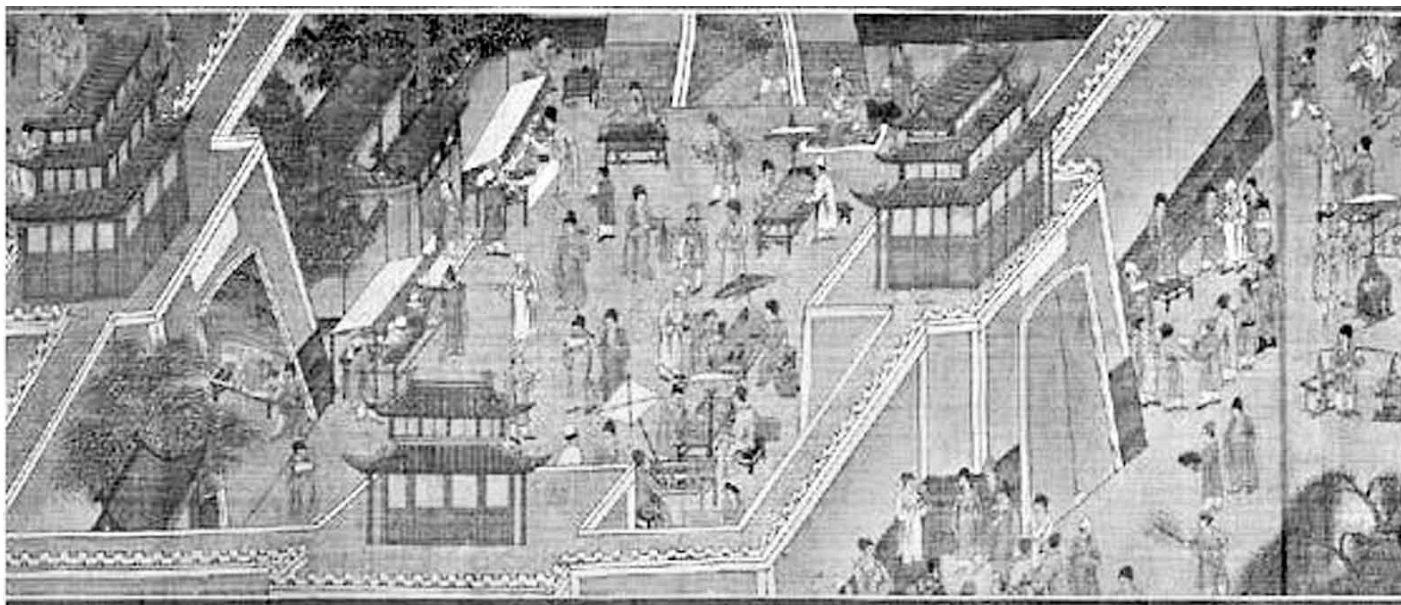


## 热历史

## 明清时期如何疏解北京人口

今年北京市将进一步加大疏解城区人口力度,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调控等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说到疏解城市人口,古已有之。为调控北京的城市人口规模,明清时期就曾采取过多项措施疏解人口,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反映明代北京的《皇都积胜图》

光绪年间,北京城市人口达108万人  
开始逐步疏解京城人口

据《北京志·人口志》记载:明初北京城市人口经过自发离散和明太祖强制迁徙,原元大都地区居民大量流失,只有9.6万。此后人口恢复和增长主要得益于军卫人口和塞外军民等新移民的大量迁入。到洪武八年(1375年)北京人口为14.3万。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自南京迁都北京后,依南京之例,将北京城按方位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随着移民政策的不断推进,北京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到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北京城市居民约13.4万户,以每户5口人计,则明代中后期北京城总人口约68万人。如果加上驻京的军人及眷属以及居于皇城内外直接服务于宫廷的人员,万历六年(1578年)京城人口已达17.9万户,85万人。按照内外城62平方千米面积计算,城市人口密度大大增加,达13710人/平方千米。

清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城市管理制,包括内城、

外城和城属(京营四郊)三个地域单元,但顺治初定都北京即于内城“分八列旗,拱卫皇居”,并迁移内城汉人之官商贾于外城,推行兵民分城居住。由于大量旗人内迁和北京内城被圈占,以及北京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内城八旗户口的迅速增殖,清初北京内外城人口约11.7万户,55.6万人,其中内城八旗人口约8万户,40万人。随着政权的稳定,北京人口不断增加。据《北京志·人口志》记载:乾隆末年(1795年),北京内外城人口约15.74万户,74万人。至光绪八年(1882年)北京城市人口21.8万户,108万人,人口密度达17419人/平方千米,形成了“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余地”的局面。

为缓解京城人口增长压力,明朝从弘治年间开始逐步疏解京城人口,隆庆、万历年间仍继续坚持实行调控北京人口的各项措施。清朝从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先后采取多项措施疏解人口。

明弘治年间开始外迁驻军兵力  
清雍正年间开始外迁八旗兵丁

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大量卫所军士迁居京师,导致北京城市人口剧增。为疏解城市军事人口,加强外围防御,弘治年间开始外迁京城及京畿卫所军士,实行边屯屯居。在长城沿线设置9个军事重镇(亦称“九边”),后又在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统领大批卫所官兵保卫边防。他们大多亦兵亦农,战时打仗,平时从事种植和畜牧业生产。京郊及周边地区以“营”“堡”“卫”等而称的地名,相当一部分与当年的卫所军士迁离京师、戍边屯居有关。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外迁八旗兵丁及眷属。一是逐步放松对京师旗下官兵严格集中聚居的管理,按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和镶蓝等旗分别建营于城郊,迁移部分内城兵丁携眷分驻。至乾隆中期,清政府于四郊建造营房累计达4.8万多间,派驻京师八旗子弟人口总计约8万人,连同眷属共约9万人。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于香山设立健锐营,常规编制2000多人,另有眷属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设蓝靛厂火器营,有各种营房、官房1700多间。

二是外迁闲散旗人移驻京畿或东北屯种。雍正二年(1724年),以京畿新城、固安官地341顷制为井田,令无业旗人屯种。乾隆二十

一年(1756年),再次疏解闲散旗人,原定计划3000户,分为六旗,每年派遣一旗,每旗500户,仍是按旗摊派,而且规定要“择其族众,有眷属者拣派”,眷属一律不准留京。从《清实录》中的记载看,从北京迁往拉林(今黑龙江省五常市)、阿勒楚喀(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旗闲散人共有3000多户,以每户5口人计,共1.5万人。

三是将部分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占籍州县。康熙后期,即已准许部分汉军旗下壮丁“出旗为民”,但数量较少。至乾隆初期,不仅汉军旗下壮丁,而且连同汉军八旗兵丁自身在内,均成为出旗为民、占籍州县的对象。清末,京师八旗人口的贫困化,迫使清政府进一步放松对京师旗人的禁锢,规定“八旗准出外贸易及在外寄籍”,且“准与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对京师旗人“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其生”的政策,不仅改变了京师旗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依赖国家粮饷生计的状况,而且也达到了疏散内城旗人,减轻清政府财政与经济压力的目的。

总体上看,这项措施为缓解明清时期京师人口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效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应是北京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创举。

## 明朝开始劝返外籍流民,严控占籍京城

明代朱棣称帝初期,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曾实行移民政策,大量屯兵、屯民、屯商于北京,充实京城及京畿人口。但随着人口膨胀,那些外来移民又成了疏解对象。一是实行较为优惠的政策,鼓励移民返乡。如根据每户的人口数量及路程的远近,给予一定的盘缠(路费)和安置费等,所以不少人愿意返乡。短短几年就有不少人返回故乡,其中以来自山西的移民居多。二是整治关厢,遣散游民。《明史·食货志》载:“在地曰坊,近城曰厢。”即城门外大街及其附近地区为“关厢”,也就是泛指城外两三里之内的居民聚集地。这些地区也是大量商贩和失业游民聚集地。从隆庆年间开始,朝廷令顺天府会同五城兵马指挥司整治关厢内外,并令所辖大兴、宛平二县配合,将整治重点锁定于永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朝阳门关厢,因这四个城门处于京城的东南西北方向,城门内外聚集的人员最多。特别是德外关厢,区域

最大,居住人口最多。顺天府制定了相应整治政策:没有“京籍”者,须搬至离京百里之地;房子可以拆走,如愿意空手出门,可以领到一些补偿款;有“纳户执照”者(即工商执照),“营业者不得超过五人,超者裁之”。经过几年的整治,到万历初期,各关厢内外居民大为减少。

清代前期,由于民族压迫,京畿圈地,土地兼并及自然灾害等,有大量破产农民等不断涌入北京谋取生计,致使京城人口迅速增加。清代首先对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实行严格控制,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以房管人。“官府按月点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环簿,详细诘问,毋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其次就是遣散流民回原籍。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立宜拨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

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京居住。”直省人民不得入居京师,便滞留、占籍于宛、大二县,造成“顺天大、宛两县,土著甚少,各省人民来京,居住稍久,遂尔占籍”的现象。这一方面限制了外城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大、宛二县人口的机械增长。

不过,乾隆中期之后,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师的政策明显改变。乾隆初年,乾隆帝即认识到:“流民资送势亦有所难行,不如听其自为觅食谋生”。这是清政府对资送流民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至咸丰年间,据《清文宗圣训》载:“流民中谋生者,多系故土并无田庐倚倚之人,而必抑令复还,即还其故乡,仍一无业之人耳。”据此推断,自乾隆中期开始,即逐步放松了对流民的驱逐,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当时,除京畿移民之外,来自山东、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谋生者颇多。



清末永定门外商聚集

## 清代限制官员寄籍京城,鼓励返乡养老

清代还有一项针对特定官员胥吏群体的疏解措施。康熙中期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后来虽对解任、休致、丁忧官有所其自便的宽容政策,但事实上固于达到了疏散内城旗人,减轻清政府财政与经济压力的目的。

清朝退休制度规定,年满60岁的官员即可退休。退休官员一般均回原籍养老,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但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如,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因病且年事已高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亲自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令其回乡所经过之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

料理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10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30余口返乡。乾隆帝此举使不少辞职、解任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同样减缓了京师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明清时期北京城市人口的疏解之策,有效缓解了城市承载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我们疏解北京人口,尤其是城区人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摘自《北京日报》)

## 2000年前就出现了染发

## 王莽为显年轻染黑发



王莽

染发已经成为时尚,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改变头发的颜色,配合服饰和妆容,充分显示自己的个性;而中年人由于不断长出白发而不得不频繁地染黑。

染发现象并非当代所独有,而是源远流长,自古有之。包括皇帝在内的古代上层社会有过此举的人不胜枚举,王莽便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染发的皇帝。

## 南唐开国皇帝为装成熟,服药让头发变白

对于普通人来说,染发无非就是为了美观,为了好看,目的比较单纯;而对于帝王将相那些政治人物来说,他们的言行举止包括染发这一生活细节,都往往与政治挂钩。如南唐开国皇帝徐知诰初当宰相时,因担心“非老成不足压众”,于是“服药变其鬚髮,一日成霜”。显然,通过服药让头发变白,是为了装成熟,扮沧桑,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更加稳固,更上一层楼。但新朝皇帝王莽将白发染成黑发又是为什么呢?

王莽,字巨君,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后迁至济南东平(今山东章丘)。王莽自幼丧父,姑姑王政君当了皇后之后,他的叔叔大爷均被封侯,唯独王莽的父亲早亡未得封赏。家道不幸,家境寒酸,使王莽从小就恭俭有礼,广交名人儒士,因此颇受赞誉。后来,在大爷王凤的推荐下,王莽当上了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掌管弓弩兵,不久后又被封为太中大夫。此后,王莽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从大司马到宰衡,最后当上了“摄皇帝”,总揽国家大事。

后来,野心勃勃的王莽代汉自立,建立两汉之间短暂的新朝。

王莽的书生气很重,执政后推出的一系列意在“复古”的改革计划,富于幻想,过于荒诞,非但没有推动社会的进步,反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无论是黎民百姓,还是豪强地主,都对这个浑身上下散发迂腐气息的新朝感到很失望,很痛恨。于是,各地起义连绵不绝,风起云涌。推翻新朝,打倒王莽,一时间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呼声。强大的绿林军、赤眉军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从蚕食到鲸吞,迅速向新朝的统治中心长安逼近,王莽的新朝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境地。

王莽在头发上作秀  
将白发染黑

一向自负的王莽不甘心失败,他要做最后的挣扎,寄希望于万一。为此,他必须向爪牙们示以镇静,以安人心,即《汉书》提到的“欲外视自安”。经过搜索肠脑,王莽想到了通过大办婚礼来欺人惑众的法子。自从王皇后死后,皇后的位子一直空着。举办一场皇帝大婚的盛大典礼,立一个新皇后,或许会有粉饰太平的作用。出于这种想法,王莽在农民起义的呐喊声中向全国下发了选美诏令,一批美女被选进京师长安。经过层层筛选,王莽最后选定杜陵史家的女儿为皇后。这一年,王莽68岁,已是皓首白须的老翁了。

大婚那天,王莽把自己花白的头发连同胡子染成黑色,“乃染其须发”,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貌似精壮的小伙子。王莽用什么法子将须发染成黑色,正史中没有记载,《汉史演义》称“莽年已六十有八,须发尽白,他却用煤涂发,用墨染须,假充壮年男子”,这显然有戏说和嘲讽之意。

王莽原本就善于在头发上做文章,大爷王凤病重时,王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试想,王莽当时再孝顺,再投入,还不至于抽不出一点时间来洗脸梳头,可他却故意把头发弄得乱蓬蓬,把脸弄得脏兮兮,以此来表现他在照料王凤时的无暇自洁和忽视自我。正是这幅“乱首垢面”的可怜相,如果当时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活动,王莽无疑会荣登榜首。数十年后,王莽在大婚时故伎重演,又在头发上作秀,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摘自《三秦都市报》)

## 掌故

## “破天荒”破的是进士荒

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凡是考进士的人,都由地方解送入试。每当京城会考,地方上总要解送一批考生赴京应试。当时荆南地区四五十年来竟没有一个人能考中进士。于是,人们称荆南地区为“天荒”,意思是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或是荒凉落后的地区,讥笑那里几十年

没能考上一个进士。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荆南应试的考生中有个人考中了进士,总算破了“天荒”。由此,旧时文士常用“破天荒”来表示突然得意扬名。现在用来指从未有过或第一次出现的新鲜事。(摘自《青年科学》)

## 上厕所称为“解手”的由来

大小便叫“解手”,据说是来自于古代强制性押解迁移人群的途中。

那时迁民是强制性的,移民官员和押解的差人怕迁民半路逃跑,在编队定员之后,便把他们捆绑起来。每人绑一只胳膊,几十个人连在一条绳子上,相互牵连在一起。因此,如果其中有人要大小便,就要

求押解的差人,给他们解开捆在胳膊上的绳子。最初时,人们为了把意思传达清楚,话说得比较完整:“请大人把我的手解开。”后来说得多了,渐渐就把原来的话简化了,只要有人高声喊“解手”,那就是他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摘自《郑州日报》)

## “三思而行”原指犹豫不决

三思而行,一般辞书释为:经过反复考虑,然后才去做。也就是说,该词意含褒义。

事实上,三思而行最初意含贬义,《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意思是说:季文子每事必三思才去做,孔子听到后说:经反复考虑就可以了。实际上,孔子是批评季文子做事过

于谨慎、犹疑不决、优柔寡断。季文子是春秋时鲁国的大夫,据说他在执政期间处事十分谨慎,每事必三思而后行,却屡屡出错,所以,孔子反对季文子的行为。他认为凡事经正反两方面考虑之后,权衡其利弊即可作出决定了,无须再三考虑,犹豫不决。(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欢迎广大读者朋友扫码关注鹤壁日报文史博览微信公众号,看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读者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中留言,向我们推荐您觉得有意思的文章。

